

中国文联联合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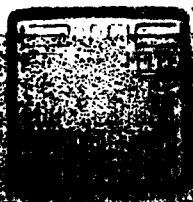
张 洁 著

在那绿草地上

I267/277

ZAINALÜCAODISHANG 在那绿草地上

张 洁 著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942241

在那绿草地上

张 洁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出版

(北京西单太仆寺街39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戏 剧 印 刷 厂 印 刷

787×960毫米 32开本 6.5印张 4 插页 104千字

1983年10月第1版 1983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号：10313·140

定价：0.59元

目 录

上路	1
空中小姐	10
打响震动世界第一枪的“老北桥”	18
霍桑的食谱	21
音乐系主任卡尔文·保尔教授	28
库特·冯尼格说：NO！	39
我不后悔到纽约去	54
愿人人长命百岁	62
在杨伯翰大学讨论《红字》	69
岑岑，我看到了北极光	78
关于自由	83
那值得吗？	88
芝加哥，没有太阳的街	95
好香的玉米花	101
金斯伯格，你将怎样呢？	109

东道主们	116
从头到尾	143
美丽的依阿华女郎	159
“嘭？”“NO嘭！”	170
保尔哭了	190
生意兴隆通四海 财源茂盛达三江	199

上 路

碰上一个美国人，他也许会这样说：要是这本书写得不好，亲爱的，那可不能怪我。你知道，因为我把那支银色的，日日夜夜伴随着我的，曾使我写出那些或令人憎恶，或令人尚可一瞥的文字的笔，失落在波士顿飞往丹佛的飞机上了。

好象我会掉进太平洋里淹死，再也看不见他们了——虽然在九次飞行(其中两次横渡太平洋，飞行时间十五小时以上)和十八次的起落中，我想都没有想过可能失事的问题。

同行的人已经进入了那个“大玻璃盒子”——从那里可以通向候机室。而我却掉队了——我老是掉队，没法儿，自小如此——一步一回头地望着被拦在进口处那儿、前来为我们送行的人们：全国作协和北京市作协的领导们和同志们。那中间还有穿桔

红色上衣的、小不丁点儿的、我亲爱的女儿。有人把她拉到人群的最前面，以便我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她。

然而我要看的却不是她。

逆光。我已看不清他们每一个人的面孔，在或蓝或灰的上衣上似乎模糊成一片。我只是感觉到他们每一个人。

我的心里升起一片暖意——好象一个人在黑糊糊的、冰天雪地的野地里走了很久，而终于来到明亮的、炉火融融的房间里所感到的那种全身心的松弛。耳朵尖、手指头尖、脚趾头尖……一切神经末梢的知觉从麻木、僵冷中渐渐地恢复，变暖了，变软了，你甚至可以体味到一种溶解时的苏苏感。

我为什么老是遇见好人？好人，这儿童的而不是作家的语言，我欢喜它的朴讷。

也许已经永远无法言说了。虽然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对我说过他们曾为我做过的一切，然而我知道，从别处。我也不曾道过一声感谢，中国人自有一套表示感情的方式。一切都在我的心里，天知道，我并不冷傲，一点也不。

透过舷窗，可以看见越来越远去的然而又是越来越广阔的山川、大地，无际无边、无边无际……好象在看一幅巨大无比的绘画，而它又是鲜活的，有

生命的。它那雄浑的气势在山川、大地之间升腾、回荡，仿佛要透过舷窗扑到你的脸上。这感觉是我们置身其中所不能相比的。那好象是在看一幅绘画的细部：你看到的，只能是周围的几棵树或几十棵树，几张或几十张漂亮或不那么漂亮的面孔……却无法得到这样一种整体的感觉。

我是个缺乏好奇心的人。历次乘飞机，并不着意向舷窗外张望什么。记得第一次乘飞机时，也只是看看从舷窗外掠过的云，后来索性连云都不看了。我顾不上，心里头总是有那么多火急火燎的事让人费尽心思。我老是觉得累，可又休息不得。说也奇怪，并没有人逼着我非累不可，也没有人不许我休息，全是自找！

现在，我可以休息了。我想不休息也不行。我已经悬空，再也挨不着可以让我在上面折腾的那块地皮了。

我应该睡觉。头天晚上，送走第三批客人的时候，已经十一点了，然后又写了封信。一边写信我一边想，要是我掉进太平洋里的话，这便是我留在世上最后一封信和最后一点愿望了。到那时，这封言之无物的信，也许会因此而有点意思吧。躺到床上之后，又翻来复去地想，还有哪些事情没办？或是忘记了？没有了！可又好象还有件什么顶

重要的事情没有办完，牵肠挂肚的让人睡不好觉。

这是真正地远走他乡，我自脱娘胎以来也没有过的远行。八千多公里！

我的眼睛仍旧离不开舷窗外的那块土地。我生长了几十年的土地。阡陌交通、往来车辆已经越来越难以辨认，可我还在徒然地猜想，哪辆是载着送行的人们返回机关的车？他们该是已经过了农展馆了吧？

我还是睡不着。奇怪，搅扰我睡梦的，既不是将要踏上那块陌生的土地，也不是砸得我晕头转向的那几个冷冰雹子。那些个当时在我看来非同小可的、不说个谁是谁非简直就会天塌地陷的事，比起刚才我看到的那幅巨画，显得多么琐碎、多么卑微啊！

充塞着我脑子的，净是那些个不相干的人和不相干的事。

107 路电车。西直门站附近。人行道上，老槐树的荫凉下，那个练正步走的、戴红领巾的小胖子。两眼正前方，鼓着腮帮子……他可能在准备一个运动会的开幕式？在队旗下，踩着小铜鼓敲出来的点子。我朝他微笑，他没有看见。啊，队旗，

队旗，我也曾扬着给太阳晒得黝黑的小脸，向它致过少先队员的敬礼。那是在哪儿？在草坡村的山沟沟里。好远、好远的日子了……

夏天，那个大雨滂沱的日子，我去中宣部会一位同志。打着伞，站在传达室外，说明我的来意。从屋檐上落下来的滴水，打在我的雨伞上，噗、噗、噗地响成一片，似有千军万马在我的伞顶上驰过。传达室里的那位同志对我说：“同志，请进来说，外面雨大呢！”

我怎么也记不起这个人的样子了。黑黑的脸膛？线条粗犷？不，不行，想不起来了，可是我老记着他这句暖人的话。

我终于买了一对正式的沙发，木头扶手，驼色线绀的套子。再也不必为我那些早早就发了福的朋友们犯愁了。在这以前，每每他们那过重的身躯，往我那又窄又小的破沙发上沉沉地落下去的时候，我老担心底座上的弹簧会突然崩断，从而使他们卡在底座的木头框子里不能拔身。事实上那弹簧已经断了两根，就那么耷拉着，要是偶尔有什么东西滚落到沙发的下面，掏东西的时候可得注意，一不留神就会划破手背。

一九七六年地震之后，一大堆搭抗震棚的木料堆在床下，实在有碍观瞻。有位好心人便帮我拿去找木匠做了沙发。钱花得并不比新沙发便宜多少。扶手和四条腿疤疤拉拉，露着没上色也没上漆的木头茬儿，坐上去摇摇晃晃，吱吱嘎嘎，跟熊爸爸和熊妈妈坐的椅子差不多——我还记得小时候在童话上看到过的那个——虽然有人对我说那些木头足够做一个柜子，但我并不在意，重要的是那一大堆木头没有白白地糟踏，终于变成有用的东西了。

中午，从家俱店出来，货运三轮车服务社的工人已经下班了。调度员老爹对我说，下午两点才上班呢！怎么办？我自然可以先坐在新沙发上过瘾，可我实在舍不得两个小时的时间。我向调度员老爹诉苦，他挺痛快地包揽下来：“您走人，把家俱存我这儿，留下地址，一上班我就让人给您送去。”并且把家俱给我搬到凉棚底下。“您放心，别担心变天，就是下雨也淋不着，我这儿有塑料布呢！”

正说着，又来了一位男同志，还拾元钱。“谢谢您了，那柜子是最后一个。要不是您借给我钱，等我回家取钱这功夫，早没了。”

“您认识他？”我插嘴。

“不，不认识。”调度员老爹说。

下午，不到三点，就听见有人在楼下吆喝我的

名字。家俱运来了。蹬三轮的又是一位老爹。精瘦，弓着年长日久累弯了的背。汗水象油珠子一样淌过他古铜色的脸膛和后背。我请他上楼歇一会儿，喝点清凉饮料。他死活不肯，“回去还要拉别的货呢！”——并没有人看着他，是不是？

哦，老爹，老爹们！

从来不笑，也不肯多说一句话，进门儿就掀琴盖，盖上琴盖拍屁股就走的调音师，无论如何不肯收我的钱。因为“你们一家人太好了”。

我好么？关于我，他又知道些什么？

一共二百多根。每次调音要把每根弦来来回回地拧上几遍。那敏感的耳膜至少要接受几百次不谐和噪音的击打。一个神经最健全的人，调完一次琴至少也需要几个小时的休息听觉才能恢复正常。我在《参考消息》上曾看到日本一个儿童因为忍受不了噪音的公害，把脑袋伸到汽锤底下自杀。

然而调音师穿着令有些人侧目的花格子短袖衬衣和牛仔短裤，也许头发还稍许长了那么一点。

三个多小时……

香港……

我并不觉得我已离开。

晚上，有朋友送来上品水果“香水梨”。塑料膜似的薄皮下，是水晶一样的梨肉。但吃起来却不如北京的“雪花梨”那么甜，那么有嚼头。

北京！

我含住嘴里正在嚼着的那口梨。

那大西瓜呢？那船呢？

“我想划船。我想划船。”我有二十年没划船了，这句话就在我心里嚷嚷了二十年。可我怎么也下不了决心去颐和园。我怕，怕我再也找不到旧时的情怀。上哪儿去找啊，我那快活的脚印。

哦，哦，多亏一位善体人意的好人！

去年？哦，前年！刚刚立过秋的一天，早上还下着不小的雨。谢谢那场雨，人们才会躲在屋檐下，只剩下我们这两个勇敢的傻瓜，否则我们怎么能租上船呢？

天公有意作美，刚上船就晴了天。

啊，还记得，我们还记得那些要领：两手用力均匀，桨要平，下水要轻，吃水不要太深……船儿象梭子一样在层叠的涟漪上穿过，也在我们额上和眼角上那些层叠的皱纹里穿过，把我们已经失散的东西重又编织在一起。我笑了，微微的，苦苦的。

十七孔桥上，我们和另一只对头的船在同一个孔道里相遇，眼看就要相撞，那船上年轻的划手已

手忙脚乱，不能控制船的方向。我们竖起一只桨深深地插进水里，船头擦过年轻人的船舷，迅速地斜刺过去。我看见他们惊讶而羡慕的目光，我得意得脸红了。我们老了，可是我们还行！我好象突然越过了二十年的怀疑、徬徨。

我快乐，于是我笑得太多，说得太多，熏鱼吃得太多，我渴了。

我们想念寄存在公园门口、没有被允许带进公园的大西瓜——为的是防止游人乱丢果皮影响园内的清洁卫生。只好游兴未尽地上了岸，领回我们的大西瓜。一，二！从正中切开，各自抱了半个在怀里，吃！可我们无论如何也吃不完，它太大了。如果不是那么大，我们也能装在提包里，偷偷地带上船了。唉，真可惜！无论如何也吃不完它！而那是我有生以来吃过的最甜、最好的一个瓜。

可我总不相信它是最好的一个。一定还有更甜、更好的。我非找到不可。我馋，谁不知道么！

后来，在美国，我也找过。因为有人告诉我，美国的西瓜个个是甜的。是的，不错，个个是甜的，可就是甜不过我那个！

我想，要找，还得回家！

空中小姐

小姐，太太这一类的称呼，早已从我们的词汇中消失了。但在美国却常常被人称为madam，很觉刺耳。我想在美国这称呼也不一定受人欢迎，特别是职业妇女。因为出现了一个新的词汇，叫做Ms.。这新称呼也许表达了职业妇女，使自己区别于依别人为生的妇女的一种愿望吧？我倒是赞成这种语言上的改革，随着生活的前进，语言学也将会不断地发展。

但对泛美公司飞机上的乘务员，还是按照国际上习惯性的叫法，统称“空中小姐”，这好象已经成为了飞机上的乘务员的专有名词。当然也有例外，我还是看到过两位男士，去洛杉矶的飞机上一位，从旧金山返回香港时一位。其余各次班机上均为女士。

我老是记得念中学时，在火车上看到过的一个白俄女人的小腿，因为那双腿实在太特别了。大冷

的冬天，穿着一条裙子，套在一双黑色小皮靴里的小腿，粗得简直不象腿了，倒象两个小水桶。打那儿以后，我老觉得所有的洋女人，除了电影明星和芭蕾舞演员之外，大概都是高头大马，结实得象个啤酒桶子。

自从上了泛美公司的飞机，以及后来在美国几个城市看到的大多数美国妇女，彻底地纠正了我的看法。

飞机没起飞之前，她们一个个笑容可掬地守候在舱口迎候乘客。描眉画眼，口红胭脂，耳环项链，戒指手镯。浑身上下，再也找不到一处没有武装起来的地方。合身到加一分太肥，减一分太瘦的工作服，衬托出符合标准的三围尺寸(偶尔也有超过标准的，但绝不失之肥胖)，踩着极细极高的鞋后跟，走起路来袅袅娜娜，可爱极了。我想供认不讳，我喜欢看漂亮的女人。我真愿意女人们个个都姣好、文静、妩媚，这都是可爱的女性的特点，有什么不好呢？为什么要违反自然的规律呢？

想必她们不是那些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在美国可以看到一些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头发剪得象男人一样短，不戴胸罩，拒绝男士们的帮助，如开门、让座位、搬椅子、拿大衣等等，更还有一定要当巡捕的，拿着特制的小手枪(大了拿不动)，去追捕凶

残得象“黑手党”一类的逃犯，当然，同时还要搭配上几个男巡捕（这似乎不符合机构精简的原则）。

那些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好象把女性和女权对立起来了。我想我们还是应该承认女人和男人在生理上的差别，男人在体力上办得到的，多半女人办不到。这并不就是女人和男人在智能上的差别。即使在政治上、经济上获得平等权力之后，妇女还应该懂得并认识，她对社会所应承担的责任、义务和男人是一样的。她的聪明才智和男人是一样的。有些妇女，却把力量放在要求男人和社会的承认上，而忘记自己应该做些什么。不要要求，而应该干得使男人和社会不得不承认，用自己对社会的贡献，去改变他们歧视妇女的观念。

但我完全可以理解她们的激进。因为在美国这样一个文明的社会里，至今还确实存在着男女同工不同酬的合法现象。据说去年有八位妇女曾为此绝食抗议，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因为这种现象得到法律的承认。

性格，同样也是社会的产物。女人的雄化，恐怕也只能从社会因素中去寻找它的原因。

我说这些，绝无反对女权运动的意思。

一位洋太太曾问我：“你们中国有女权运动吗？”